

《易学哲学问题研究》丛书
郑万耕 / 主编

章伟文 著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易学哲学问题
研究”（05JJD720010）结项成
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
古代哲学研究中心项目成果。

长江学术
文献大系
哲学卷

易学 历史观研究



長江學術

文獻大系

哲學卷

《易学哲学问题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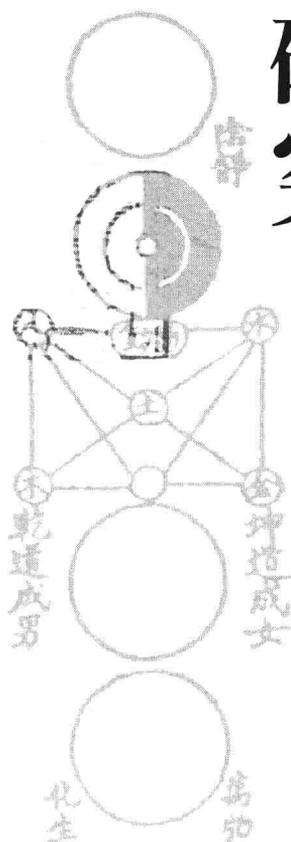
郑万耕 /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易学哲学问题研究”(05JJD720010) 结项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项目成果。

章伟文 著

易学

历史观研究



上海圖書館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学历史观研究/章伟文著.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1
(《长江学术文献大系·哲学卷·易学哲学问题研究丛书》)
ISBN 978-7-5439-5741-1

I. ①易… II. ①章… III. ①《周易》—历史
观—研究 IV. ①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8683号

责任编辑:张 树
李 莺
特约编辑:王群采
肖 静

易学历史观研究

章伟文 著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2 字数 250 000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9-5741-1

定价:25.00元

<http://www.sstlp.com>

目 录

引言:易学历史观导论	1
一、《周易》经、传与历史观	3
二、汉唐易学与历史观	5
三、宋明易学与历史哲学	10
第一章 《易传》的历史发展观	14
第一节 《周易·系辞》的历史观	14
一、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14
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历史变化、发展的状态	17
三、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人可以认识、理解历史的变化和发展	19
第二节 《周易·序卦传》的历史观	22
第二章 玄学易中的历史哲学——以王弼为中心	25
第一节 论理想社会的历史蓝图	25
第二节 对历史价值的肯定	33
第三章 图书易学与历史哲学——以陈抟、邵雍为中心	37
第一节 陈抟的易学历史哲学思想	37
一、陈抟的“易龙图”与宇宙自然演变之历史	37
二、“龙图易”与陈抟社会历史观的关系	45
第二节 邵雍的易学历史哲学思想	52
一、“分阴分阳,迭用柔刚”:论宇宙自然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	52
二、“皇帝王伯”与“元会运世”:论历史发展的阶段和过程	56
三、“显诸仁,藏诸用”:论历史的形上理体	61
四、“数往者顺,知来者逆”:论历史发展的循环及规律性	65

第四章 以史证经与历史哲学——以司马光、杨万里为中心	73
第一节 司马光的易学历史哲学	73
一、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原则——易道：凡宇宙之间皆易，易者阴阳之变、五行之化也	74
二、《周易》的历史功能：见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终	80
三、历史的内容与形式——义与数：圣人作《易》，为数亦为义，义急、数亦急	87
四、历史的理想存在方式：阴阳之道表里相承；阳非阴不成，阴非阳不生	93
第二节 杨万里的易学历史观	102
一、论历史生成之基础：易者，生生无息之理也	102
二、论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易》形天下无形之理、穷天下无穷之事	107
三、论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过程：易道之用存乎变	112
四、论历史发展的规律：易道之体存乎常	115
五、论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易道之行存乎人	120
第五章 宋儒易学中的历史哲学——以程颐、朱熹为中心	125
第一节 程颐的易学历史哲学思想	125
一、“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论历史发展的动力	125
二、“随时变易以从道”：论历史规律与历史价值的评判标准	130
三、“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论历史现象与历史本体的关系	135
第二节 朱熹的易学历史哲学思想	141
一、阴阳有个流行底，有个定位底：论历史发展的形态	141
二、“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对历史本体的思考	146
三、历史之理想：王道政治	153
第六章 对宋明易学历史哲学的总结——王夫之的易学与历史哲学	158
第一节 “理势合一”的历史发展观	158
第二节 “天地之化日新”的变化观与“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的历史发展动力观	170
第三节 “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历史辩证法	178
结束语	181
主要参考文献	183
关键词索引	186

引言：易学历史观导论

通常认为,历史指的是人类过去的活动、创造和经历;历史学则是指人们对过去活动的记述和认识;而历史观则是指人们把客观存在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从中概括、发现其本质、意义、发展方向、模式、规律等所形成的宏观历史理论,它要在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或历史进程的一般性质中去发现某种哲学价值、意义。从内容看,历史观主要包括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等等,具体说来,它主要研究历史的主体与发展动力、历史单位与历史文明、历史分期与阶段、历史过程与规律、历史真理与价值、历史认识与理解等问题。

在哲学历史观的基础上,近现代以来,学术界又进一步研究历史哲学的问题。国内研究西方历史哲学较早的著名学者韩震先生认为,“历史哲学”的兴起有其不可缺少的条件,其中包括历史性与普遍性相结合、“世界主义精神”的形成等(参见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至27页)。因为“世界主义精神”的形成,是建立在历史研究从地域史走向世界史、建立在人类开始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加以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这在韩震先生看来,只有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后才可能得以真正实现,故历史哲学出现比较晚,它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历史理论是以哲学历史观的形态存在着的。应该说,中国历史哲学发展的情况与之基本类似但亦有自己的特点,如为了论证汉王朝确立的合法性,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三统”“三正”等理论,实际已建立起较为系统、规范的历史哲学理论。所以,哲学历史观与历史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可以说历史哲学是哲学历史观,而哲学历史观则并不都是历史哲学。就好比禅宗属于佛教,但佛教并不等于就是禅宗一样。

历史观或历史哲学重在用哲学的眼光考察人类历史。它以一定的价值观为指导,用一个哲学理论的体系来再现人类历史的进程,把人类历史发展当作

一个整体来把握,使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已经逝去的人类往事,得以置于哲学概念、范畴和价值的规范之下。因此,历史观、历史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在思想和范畴方面与哲学有一定的相互涵盖。但是,历史观、历史哲学又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历史观、历史哲学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经验性,它在运用概念的时候始终不脱离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正因为历史观、历史哲学以人类的历史活动及其结果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它与历史学在对象、内容上有一定的交叉和相互渗透。但是,历史哲学与历史学也有所不同,历史学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活动、历史人物等,而哲学历史观和历史哲学则主要是研究历史的“一般本质”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乃至探讨历史的真理和价值、历史认识的性质和意义等问题。故历史观、历史哲学既不同于历史学,又不同于一般所谓哲学,而可以看作是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我们认为,历史观、历史哲学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历史哲学,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以前的历史知识,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可以为人类面向未来,寻求自身存在的意义、价值作贡献。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提出:“认清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人们只有借助于历史意识,才能真正了解“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人类终极问题,并以历史意识为基础来展望和创造未来。历史观、历史哲学通过从宏观上把握人类社会不同时代交替的秩序以及原因来了解人类文明盛衰兴亡的历史命运,从中要寻找出一条既能保存人类文明积极成果,又能摆脱现代文明僵化模式的出路,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合理的价值取向,故研究历史哲学的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益显重要,它深刻体现了哲学的终极关怀。

西方从18世纪以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过程,研究历史认识方法和性质的历史哲学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涌现了一大批研究的专家,如维柯、伏尔泰、卢梭、孔多塞、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狄尔泰、文德尔班、克罗齐、柯林伍德等。相比之下,中国历史哲学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往往采用一种抽象、孤立的方法来看待历史,对之缺乏哲学的思考,这样就很难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中抽绎出一般的历史规律和认识,难以准确揭示出历史发生和历史认识的一般原则。应该说,中国历代的思想家们和历史学家们也都非常关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对历史演变的动力、过程、历史认识的性质等也都进行过深刻地哲学思考,但他们的这种思考往往没有形成系统的、专门的论著,他们对历史的哲学思考也往往分散在不

同的经籍著作中。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及其著作中的哲学历史观分别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最后融会贯通,才有可能真正创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理论体系。

对有中国特色历史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易学历史哲学的探讨。易学历史哲学主要考察中国历代易学思想家们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发展终极原因和动力、历史认识之方法和性质、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历史主体与客体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在中国,历史的兴衰存亡,往往引发人们现实的“忧患”意识,易学所揭示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居安思危”等原则,成为人们修身治国的重要理念。通过研究,我们希望能发掘出易学历史哲学所蕴含的丰富理论思想,总结出易学历史哲学的理论特色和逻辑发展进程,以探讨其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易学具有系统的知识体系,我们认为,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有着丰富的历史观和历史哲学内容。

一、《周易》经、传与历史观

《周易》对社会历史发展问题非常关注。《周易·系辞下传》提出:“《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一般认为,《系辞》这两句所传达的意思是:《易》之制作年代大约在殷之末、周之初;周文王可能是《易》的作者,他因被商纣王囚于羑里,有所忧患而演《易》。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两句话里,读出其他的蕴意来:如果说《周易》的作者是因忧患而作《易》,那么,《周易》作者的忧患是什么呢?殷之末世何以成、周之盛德何以兴,商纣王何以失去天下、周文王何以能众望所归,当是他们忧患、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认为,《周易》对历史发展的进程、历史发展的动力等历史哲学问题是有深入思考的。

关于《周易》的历史观,胡朴安先生著《周易古史观》,认为“《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余论。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①他本《序卦》之说,

^① 胡朴安:《周易古史观·自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于古史立场而解说《周易》，认为：“《屯》卦，是草昧时代建立酋长之事；《蒙》卦，是酋长领导民众而教诲之事；《需》卦，是教导民众耕种之事；《讼》卦，是民众争夺饮食而讼之事；《师》卦，是行师解决两团体互相争斗之事；《比》卦，是开国之初，建万国亲诸侯之事；《小畜》卦，是建国以后会猎之事；《履》卦，是以履虎决定履帝位之事；《泰》卦，是履帝位以后巡狩朝觐之事；《否》卦，是天子失德，诸侯不朝之事；《同人》卦，是民众聚会，谋覆共主之事；《大有》卦，是惟一人为之长，组织民众之事；《谦》卦，是会合民众，教以稼穡之事；《豫》卦，是建侯行师，检阅军队之事；《随》卦，是《大有》之民众，随《豫》之侯以行征伐之事；《蛊》卦，是征伐归来，教民众以孝之事；《临》卦，是君主登位临民之事；《观》卦，是以神道设教之事；《噬嗑》卦，是用狱治民之事；《贲》卦，是男女会聚，结为夫妇之事；《剥》卦，是洪水为灾，庐舍剥毁之事；《复》卦，是因水灾迁徙，复其故业之事；《无妄》卦，是新居始定，未甚安宁之事；《大畜》卦，是以田猎济耕种之穷之事；《颐》卦，是以耕种自养之事；《小过》卦，是改土穴为房屋，建筑房室之事；《坎》卦，是因建筑房屋，掘土所成之坎，蓄水设险以守之事；《离》卦，是坎上置篱，以巩固防御之事；《咸》卦，是男女正式婚姻之事；《恒》卦，是夫妇正居之事；《遁》卦，是择邻迁徙之事；《大壮》卦，是努力生活之事；《晋》卦，是扩充国力之事；《明夷》卦，是文王蒙难之事；《家人》卦，是组织家庭之事；《睽》卦，是一夫多妻之家庭乖睽之事；《蹇》卦，是诸侯皆来决平之事；《解》卦，是文王决平诸侯讼狱之事；《损》卦，是文王节俭自损之事；《益》卦，是损己益人，文王得民心之事；《萃》卦，是会聚众家庭立祖庙之事；《升》卦，是萃功告成，民众上升为国尽力之事；《困》卦，是南征受困之事；《井》卦，是推行井田之事；《革》卦，是周革殷命之事；《鼎》卦，是周革殷命以后，正位之事；《震》卦，是正位以后，自治以治民之事；《艮》卦，是迁徙殷顽，使之各安其土之事；《渐》卦，是殷顽迁徙以后，教以组织家庭之事；《归妹》卦，是殷贵族之女，归于男家之事；《丰》卦，是扩大殷顽组织家庭之事；《旅》卦，是殷顽不安其居，散而羁旅于外之事；《巽》卦，是羁旅于外之殷顽，顺时而入之事；《兑》卦，是殷顽来归，说以劝之之事；《涣》卦，是教殷顽立祖庙之事；《节》卦，是立祖庙以后，教以礼文有节制之事；《中孚》卦，是会聚殷顽田猎示信之事；《小过》卦，是顽民自猎之事。”^①在胡朴安先生看来，《周易》六十四卦整个就是一部中国上古历史的展开，除《乾》《坤》《既济》《未济》

^① 胡朴安著：《周易古史观·自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6、7页。

外,其余六十卦,每卦皆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主要历史活动,同时也提出了这一历史时期人们的历史使命以及完成此历史使命所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们认为,通过对《周易》等古代历史文献的考察,将可以再现早期先民的生活经验、心智水平和状况,把握先民所处时代的历史特征,故《周易》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当是无疑的。《周易》之后有《易传》,《易传》主要是解释《周易》的,《易传》中,如《系辞》《序卦》等篇目,也蕴藏有丰富的历史观思想,我们将在下文中以专章对此予以讨论。

二、汉唐易学与历史观

根据《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后汉书·儒林传》等史书的记载,西汉《周易》之学的传授体系大致情况是:孔子传《易》于商瞿,经六世传于齐人田何;汉兴,田何传易于周王孙、丁宽、服生,又传杨何,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即受《易》于杨何,此是汉初传《易》的系统。此后,丁宽传《易》于田王孙,田王孙又授《易》施雠、孟喜、梁丘贺,故“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其中,孟喜之《易》影响到焦延寿,焦延寿传《易》于京房,故“易有京氏之学”,汉宣帝、汉元帝时期,“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此乃西汉中后期易学传授的系统,为官方易学的代表,属今文经学派。在西汉官方易学的体系之外,另有以费直为代表的费氏易的传授体系和高相的易说。《汉书·艺文志》云:“民间有费高(高相)二家之说。”《汉书·儒林传》谓其说:“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后汉书·儒林列传》云:“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

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象数之学,其特点是以奇偶之数 and 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经传文,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用《周易》讲阴阳灾变。朱伯崑先生说:“孟京易学的形成和发展同西汉的哲学和天文学有密切联系。孟京易学属于今文经学派。董仲舒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大师,以解说《公羊春秋》而闻名于当时。今文经学派解经,提供阴阳灾异迷信。此种学风对孟京易学影

响很大。”^①董仲舒在历史发展观上,提出了以“三统”“三正”为代表的一系列历史循环论思想,并初步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按照董仲舒的说法,一年十二个月中,有三个月可以作岁首正月,这三个月是子月(十一月)、丑月(十二月)和寅月(一月,也称十三月)。如果一个朝代以子月为岁首,这就是所谓“斗建子”,其色尚赤,称为正“赤统”;如果以丑月为岁首,这就是“斗建丑”,其色尚白,称为正“白统”;如果以寅月为岁首,这就是所谓“斗建寅”,其色尚黑,称为正“黑统”,这就是“三统”与“三正”的基本内容。董仲舒以夏朝代表“正黑统”,斗建寅;商朝代表“正白统”,斗建丑;周朝代表“正赤统”,斗建子。因为历史是循环的,故代周而起的朝代,仍然代表“正黑统”,斗建寅,如此周而复始。与阴阳消长、历朔更革的变化相适应,王朝在更替的过程中,在确立了岁首的正月之后,接下来就要循例而徙居处(指迁都),更称号(改换前代的制度和国号),改正朔(重新确定正月),易服色(更换衣服的颜色,主要是旗帜的颜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上天换了一个异姓的人做王,新王不是继承前人的王位,他是从上天那里接受王位的。新王接受天命而称王,制订正朔来顺应天意的改变,制作科文条令来侍奉天地,所以称“王正月”。

董仲舒“三统”“三正”等历史循环理论,以当时流行的阴阳消长的思想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了哲学的概括,对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方式和原因进行了探讨。尽管这种探讨还谈不上科学,但其可取之处在于提出了社会历史是变动不居的,这种变化的历史过程是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和认识的,人们可以自觉地根据这种变化的机制来调整政治统治策略和活动方式,顺应历史发展方向,促进社会进步。董仲舒将“三统”“三正”为代表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更替相结合,把这些具体历史经验构成一个整体的知识系统,从而将经验上升到理论,将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力图说明社会历史演进的终极原因和动力。董仲舒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研究和分析,希望发现支配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局限性,这种概括有强行将社会历史纳入自己虚构的历史发展模式的嫌疑,并且带有浓厚的神学目的论色彩,但反映了汉代学术界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努力。

孟、京易学受董仲舒历史哲学影响较大,故其易学中亦有对历史问题的深入思考。孟喜解《易》之章句已失传,其卦气说有一部分存唐僧一行《卦议》中,

^①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其易学的特点是以《周易》卦象、卦数解说一年节气的变化,在易学史上提出了四正卦说、十二月卦说、六十卦配七十二候说等。京房之《易》,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占验人事吉凶,提出了“八宫卦说”“纳甲说”“五行说”等新的解《易》体例。汉元帝时,中书令石显专权。京房尝上疏、进谏汉元帝,屡言灾异验,提出:“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①又说:“《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②京房易学虽言讥详、阴阳灾异,然其用心与出发点,在于针砭时弊以救世,其《易》所言灾异,皆结合自然与社会历史之变以探求其理,以为人事之备,表达了其人天相感的思想,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作用有所强调。当然,京房的易学历史观将复杂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简单地与四季更迭等自然现象相比附,混淆了自然与社会的界限,带有浓厚的循环论乃至神秘论的色彩。应该说,自然的过程本身是没有任何意志的,不过是单纯自然现象的有序展开;而社会历史的过程则不然,它有具体的人及其意志参与其中,受到人的主观意志和实践活动的影响,这两种不同的过程是不可以简单进行类比的。但是,正如司马光的评价:“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悟,悲夫!”^③

西汉末,社会危机四伏,讖纬流行,《易纬》兴起。《乾凿度》是《易纬》中的重要一篇,其中借助易学亦阐发了独特的历史观。其云:“变易也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和。能息消者,必专者败。君臣不变,不能成朝。纣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吕九尾见。夫妇不变,不能成家。妲己擅宠,殷以之破。大任顺季,享国七百。此其变易也。”^④强调了天地消长、社会历史变革的合理性、必然性;认为社会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是否“行仁政”、“尊贤”,商纣不尊贤、“行酷虐”则“天地反”、“殷以之破”,季历和周文王能顺自然和社会历史之变,尊贤尚能,故“天任顺季,享国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二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28页。

② 同上书,第929页。

③ 同上书,第930页。

④ 林忠军:《易纬导读》,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78页。

七百”。在讨论《周易》筮法的过程中,《乾凿度》借之还表达了对宇宙自然历史演化过程的认识,所谓“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也。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物有始有壮有究,故三画而成乾。乾坤相并俱生,物有阴阳,因而重之,故六画而成卦。”^①认为宇宙演化从无而至于有,经历了“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混沦”五个阶段,此后由浑沦而有数、有质、有物而生卦、成物、成人,其中亦有数理运行之规律,《乾凿度》将此规律看成是贯通于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对于社会历史的存在状态也有所阐明。《通卦验》认为《周易》八卦之气主宰着宇宙自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凡易八卦之气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此圣帝明王所以致太平法。故设卦观象,以知存亡。夫八卦谬乱则纲纪坏败,日月星辰失其行,阴阳不和,四时易政。八卦气不效,则灾异气臻,八卦气无应失常”^②。历史上的圣帝、明王之所以能臻世于太平,乃在于其行与政合于《周易》八卦之气出入之法度,仁政与刑罚各得其宜,故能和阴阳,调六律,风雨以时,五谷成熟,社会繁荣昌盛;圣贤通过“设卦观象”,就可以知历史之兴衰、存亡,因为卦与象蕴藏、反映了社会历史兴衰之理。如果八卦气无应失常、八卦之气不效,则阴阳不和,日月星辰失其行,灾异气臻,反映在社会、历史中,则会出现纲纪坏败、四时易政等乱世之象。东汉时期,马融、郑玄、荀爽等经师在继承费氏易传统之基础上,对西汉象数易学亦有所继承。

至于魏晋,易学之风为之一变,王弼解《易》,一扫汉易之象数,提出“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③。强调万变之易象,实由义理为之主。在此基础上,他解释《周易》,提出“一爻为主”说,此说引申开来,则认为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虽复杂多变,但并非无规律可循,它受到一根本法则所支配,所谓“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如果能掌握此根本法则,人就可以在宇

① 林忠军:《易纬导读》,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81、82页。

② 同上书,第199页。

③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周易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4页。

宙自然与社会历史之变中立于不败之地。王弼还提出“适时”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夫时有泰否，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①认为《周易》之卦各代表一时，卦之六爻则为此卦所代表之时的各种不同情况的变化；卦之时不同，则君子之行藏亦因时而异；时虽同，因爻之位不同，亦可能导致一卦六爻虽同其时而异其义。如《泰》卦之时为通达，《泰》之上六爻则“城复于隍”，预示《泰》道将灭，其义与《泰》卦其他爻之义相异。王弼由此提出，《易》之“用无常道”，与之相应，于行动中，则要“唯变所适”，君子要“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于人事之教训，强调了人与历史变化相应的重要性。由此看来，王弼虚玄的玄学易中亦有其独特的历史观内容。

唐王朝建立起统一的帝国，政治、经济得到极大发展，文化的融合也进一步加强。儒家经学在此时期有较大发展，于易学言，孔颖达主编之《周易正义》、李鼎祚所编之《周易集解》等，在存《周易》古注的同时，也注意阐发其中的思想，孔颖达的易学思想中亦有历史观方面的重要内容。如其释《周易·说卦》“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易道周备，无理不尽。圣人用之，上以和协顺成圣人之道，下以治理断人伦之正义，又能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穷尽生灵所禀之性。物理既穷，生性又尽，至于一期所赋之命，莫不穷其短长，定其吉凶。”^②认为《周易》穷尽万事、万物之理，人法《易》理，可以尽物之性、尽人之性，由此引申开来，则小到个人之运命，大到天下、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运命，皆可以《易》理穷尽之而无遗。故其疏《周易·系辞》“吉凶者，贞胜者也”说：“万变虽殊，可以执一御也者，犹若寒变为暑，暑变为寒，少变为壮，壮变为老，老变为死，祸变为福，盛变为衰，变改不同，是万变殊也。其变虽异，皆自然而有。若能知其自然，不造不为，无喜无感，而乘御于此，是可以执一御也。”^③认为无论是人类社会历史之盛衰，个人之生死、祸福，还是自然界的寒暑迭相互

①（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4页。

②（唐）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卦》，郑万耕主编《易学精华》（上），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③ 同上书，第210页。

变,皆有其内在之理,执此理则能御万变之殊而不造不为,复其自然。

汉唐易学之发展,由西汉易学之象数至于魏晋王弼易学之义理,再到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李鼎祚《周易集解》对汉易与玄学易之总结,其中不乏有深刻的历史观、历史哲学。这也正合于易学不仅阐述天道、亦切近人事的总特征。

三、宋明易学与历史哲学

宋明易学中,历史观、历史哲学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宋明儒者力图从儒学经典中去探求一种大中至正之道,将之上升为最高的理性原则和文化精神,即所谓天道或天理,并以之来制约王权在世间所具有的至高无上地位,为经世济民提供理论指导,这是宋明理学兴盛的深层动因之一。他们希望通过对理想政治蓝图的描画来规正现实政治生活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对历史发展目标、社会历史的结构及其变迁、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规律等历史哲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哲学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宋明理学的兴盛得益于对历史哲学诸问题的探究。

宋明儒者注重阐发传统儒家重现实关怀、济世利民的淑世精神,他们一方面肯定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规范的价值,肯定封建人文规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肯定宇宙天地造化的生生不息,肯定作为天地人“三才”之一的人可以因应宇宙天地自然造化生生不息的规律,不断创造符合天道的、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因此,宋明理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它肯定人类变易的、历史性的社会生活的合理性,认为不能采取摒弃现实生活,超出社会现实生活之外去寻求一个超越的彼岸天国,希望通过对理想政治蓝图的描画来规正现实政治生活的发展道路。宋明理学探讨的历史哲学问题主要有:

(1)历史发展的理想目标问题:宋明儒者希望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探求一种最高的政治理想,也即儒家所热衷的“王道”思想,或所谓的“大中至正”之道,来确立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制度和秩序,改变国家和社会的面貌。

宋明理学要为现实的政治变革提供理想的政治蓝图。这种政治蓝图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虽各有不同,但都认为这种理想的政治蓝图是社会历史发展应该趋赴的目标。为此,他们重点对理想社会蓝图进行了描画。一些儒者,如邵雍、程颐、朱熹等把理想社会上溯到“三代”或“三代”以上,认为这一

时期是历史发展的理想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就是复归到“三代”或“三代”以上的理想社会中去。

宋明儒者以“三代”及其以上的人类社会为理想社会,通常被看作是一种退化的历史观,理由是处于人类历史早期的“三代”既然是最理想的社会,其下一代不如一代,岂不是一种历史的退化?我们认为,宋明儒者所谓的“三代”,是对历史上存在过的“三代”的理想化,“三代”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这种理想社会的提出,目的在于为改造现实提供一种理想的方案和目标,正好提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的方向,貌似退化的历史观念实际上却表达了一种历史进步的观念。

应该说,对古代文化的敬仰不等于就是复古主义,正如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个过程中,通常古代的文化和文明只不过是一件外壳,在古代文化、文明的外壳之内所包含却是符合当时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内容和精神,一种代表时代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理想文化采取了古代文化和文明的形式和外壳,这不能视作是退步,而是进步。宋明儒者关于“三代”理想社会观念的提出正好为北宋社会的发展提出了理想和目标,这不能视为是落后的、退步的历史发展观。

(2)历史结构及其变迁问题:宋明儒者在对理想社会进行描画的过程中,还对人类历史结构及其变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李觏以《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为一时,认为北宋正处《泰》卦之时,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但《泰》之极,则可能城复于隍,虽然形势很好,却也有倾覆的危险。与李觏不同,石介认为北宋所处的时代以《周易》论为《大过》栋桡之时,是救乱之时,每个人都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使社会发展的航船驶向理想的目标。邵雍提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皇、帝、王、伯”四阶段论的思想。其中,“皇、帝、王、伯”属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阶段;文明社会之外,则为夷狄,夷狄虽属人类社会,但还没有达到文明社会的程度;夷狄之下则为禽兽,指的是人类所处的、还未开化的野蛮状态。程颐提出人类历史发展“官天下”与“家天下”的不同:

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择一人贤于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与子。论其至理,治天下者,当得天下最贤者一人,加诸众人之上,则是至公之法。后世既难得人而争夺兴,故以与子。与子虽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

守法者有私心耳。^①

(3)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宋明儒者一般都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规律。一些学者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都有一种既定的规律,如刘牧认为:

天地养万物,以静为心,不为而物自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动,此乾坤之心也……圣人之无心,与天地一者也,以物为之心也,何己心之往哉!^②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的过程,而是人们围绕着儒家价值本体进行自由选择的过程。如李觏主张“吉凶由人”,石介主张“夫天生时,圣人乘时,君子治时”,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人们可以认识这种规律,从而可以主动选择自己的历史;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历史有其本身的发展大势,但人在这种发展大势面前亦可以有所作为。如邵雍认为,易道即治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为太平治世;反之,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为衰世乱世。统治者进君子、远小人是达致太平治世的重要途径。程颐认为历史盛衰之理很复杂,但历史有一种运命,对于这种运命,人是有所掌握并有所作为的。宋明儒者一般都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有其大势,通其变而顺其势,人类就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人。

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要从历史的变化中去探求此规律的存在,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就能不为具体的历史事件所迷惑,为恢复王道政治奠定基础。宋明儒学的政治理想是要以实现“三代”的王道政治为目标,宋明儒者一般对此都有着强烈的信念,如程颐认为“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后之愚者,皆云时异事变,不可复行,此则无知之深也”^③。历史虽然发生了变化,但“王道”的精神是历世不变的。圣人治理国家,有所道,有所迹。道是圣人之意,迹是意之表现。后世统治者要得圣人之意而为之,不能只效法圣人治世之迹。时移世异,情况变化了,圣人的一些具体的事迹已经不适合于后世的具体情况了,此时,就要原圣人治世之意,取意而不取迹。所以: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圣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劳,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学者,得圣人

①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页。

② (宋)刘牧:《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中华道藏》第16册,第532页,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4页。